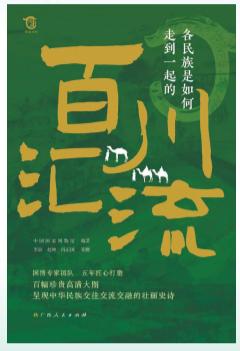


# 呈现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壮丽史诗

徐蓉晖



《百川汇流:各民族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李游、赵坤、冯正国等撰,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川汇流:各民族是如何走到一起的》(简称《百川汇流》)正式与读者见面。本书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浩如烟海的馆藏珍品中精选出近百件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文物,以“百川汇流,中华一家”为鲜明主线,全景式、实证性地展现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一件件穿越时空的瑰宝,无声却有力地诉说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深厚根基和必然逻辑。

中国国家博物馆对该书高度重视,由馆长领衔,从全馆范围内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作者团队,并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院长陈煜担任执行主编,力图将该书打造成为集学术性、权威性、可读性于一体的精品之作。全书内容上起远古时期文明孕育阶段,下至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概念正式写入宪法的重要时刻,共56篇文章,涉及石器、玉器、金银器、钱币、陶瓷、玺印、丝织品、石刻、碑帖、文书、档案等多种门类的近百件文物,通过对这些珍贵文物的多维度解读,系统展现出各民族间由松散到紧密、由多元趋向一体,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强大认同,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认识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演进规律。

作者团队基于深厚的学术积淀,将严谨考据转化为通俗的语言。从史前时期的大三棱尖状石器、河姆渡骨耜中解读中华文明的起源,在秦汉时期青铜量器、“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

中展现大一统格局的奠基及人们对国家安宁的向往,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万岁千秋神鸟画像砖、马头鹿角形金步摇等文物中解读南北文化的密切交流与互鉴,透过隋唐五代时期的北庭都护府残文书册见证西部边疆的开拓、巩固与发展,到明清时期的《东宁陈氏番俗图》册和《皇清职贡图》卷中展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服饰文化和生活场景,利用近现代《镇南关大捷图》、西藏人民抗英的武器等文物揭示各民族在危难时刻“生死与共”的命运纽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喀什市第一次全国基层选举时的选民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表决票中见证

各族人民如何进一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可以说,这本书真正实现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同时,书里配有关于精美的文物图片,加上详细的解说文字,使得读者在欣赏文物之精美的同时,进一步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这种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既增强了书籍的可读性,也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此外,为最大限度释放文物魅力,本书特邀“中国最美的书”设计师操刀设计。全彩印刷的近百幅高清大图纤毫毕现:红山玉龙、人形青铜灯、“单于和亲”砖范、合背“永通万国”铜钱、北庭都护府残文书册……一些文物即使在博物馆也难得一见,本书皆以博物馆级标准呈现,让读者足不出户,即可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中华文明深度游。这些穿越时空的物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坚实的历史锚点,见证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基因。

翻开《百川汇流》,在书页间,摩挲宜侯侯簋上的铭文,抚过斑驳的《熹平石经》残石,凝望《土尔扈特东归图》上迁徙的烟尘,触摸琼崖纵队使用的手榴弹弹带……我们便能深切感知——“中华民族”四字熔铸进历史上每道纹路与刻痕。

如今,这部依托文物讲述古老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融合、共生的内在逻辑以及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的通识读物,正穿越时光与我们对话。它像是指引我们一往无前的文明火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永远是最磅礴的叙事;百川归流的壮阔图景,始终是最动人的未来。



《天津工人:1900-1949》,【美】贺萧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祁泽宇

工人的生活图景与未尽的工业形态

诸多数据表明,近代中国工业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取得了大发展。但这种发展在空间上却严重失衡,集中在上海等主流工业城市。工业史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对尚未真正工业化城市的研究寥寥无几。作为最早一批到中国留学的学者,贺萧认为研究早期天津这样的“非工业化”城市,更能看到新旧关系的过渡状态中看到中国社会的变迁,并更易发掘人的具体命运。于是,贺萧在南开大学留学期间完成了《天津工人:1900-1949》。它不仅是政治经济史的重要考察内容,更是群体社会生活史的一部分。

《天津工人》宏观上以近代工业发展为主线,微观上从劳动雇佣、衣食住行、婚丧节庆,织就一张近代天津生活繁荣全景网络,再现天津城市化进程。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着重于介绍天津工业的历史背景、投资情况以及工人的工作状况,直接将话题引入社会史范畴;第二部分用三个个案考察了机器制造业、运输业、纺织业工人的实际情况,揭示出不同行业工人在不同时期如何应对生活以及对时局的反映;第三部分则揭示了工人们的文化生活以及抗议罢工的情况。三部分中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范围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环境影响了工作条件,也催生了不同的行为,潜移默化地熔接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内容。本书为人们展示了一幅近代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立足于大量一手资料或访谈录、报刊记录、回忆录等,读起来生动形象,也富有“人情味”。

贺萧再现了天津近代工业的实际情况,“受到政治不稳定的影响而发展缓慢,一直处于试验性和蹒跚不前的状态”,虽然外国人控制了天津口岸,但除日本占领天津后的经略外,外资几乎没有对天津工业进行投资。天津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天津的近代工业在官方的微弱支持下缓慢形成,各方势力都对工业投资缺乏兴趣,每遇时局动荡,就要面临停产或裁员。而苛捐杂税、长期战乱、外部竞争、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等原因又阻碍了工业市场的发展,本土的工业产业顺其自然地成了前资本主义遗留的产物,也仅是昙花一现,客观决定了近代天津工人地位低下也难有作为。

《天津工人》真切描述出工人群体的生活图景,1900年至1949年的天津工人在生产资料上几乎无所占用,靠劳动力赚取报酬勉强维生,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完全被资本家剥削,毫无致富的可能,在时局动荡的年代只会越来越贫困。从贺萧的记录看,工人们的食仅仅是勉强充饥,服饰仅够遮体,卫生状况极差,饱受疾病之苦,更谈不上什么像样的文化消费。多数工人因为收入低而频繁更换工作,情况往往不容乐观,却随时可能变为更苦难的底层。在这方面,天津的工人群体与中国大多数工人阶级境遇相同,也与马恩经典作家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相吻合。

天津早期工业化之所以缓慢,在贺萧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天津的大型工厂,表面上看是机械化和‘现代’的,实际上却是在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基于旧式社会关系的管理体系下运行”。在几种工厂类型中,我们发现,其一,天津没有正式的行会组织,工厂主不能保护自身权宜,工人也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诉求。工人会受工厂主剥削,还要受到其他社会势力介入盘剥,而阻碍了现代意义上劳资契约关系的形成。其二,天津工业缺乏明确的劳动力分工,多数工厂采取了“熟人担保”式的管理模式,但这种传统模式下工人流动率高,也是典型的“前工业”状态。其三,天津近代工人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进入工厂后,乡里关系、社会关系、组织关系叠加,出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网络,他们生活的环境比农村更封闭。这样,就形成了结构上既稳定又松散,关系上既传统又开放的矛盾体,极大削弱了工人的力量,也是造成天津工业化进程缓慢的直接原因。直至1949年以后,这种情况才得以真正扭转。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贺萧发现,近代天津工人阶级没有完全转变为工人无产阶级,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只能开展零星的斗争,面对与工厂主的矛盾他们只能投机取巧。贫穷和压迫导致部分工人开始罢工,但他们的罢工不是因为阶级意识的觉悟,相反仅维持现状足以平息工人们的怒火。帮会、工会或者其他中间势力无力发动影响深远的罢工抗议,工人们处于“碎片化”的分割状态,阶级阶层结构不稳定且地位低下,劳动状态处于密集型的底层,加上生活环境差、文化品位低等因素,按照卡兹尼尔森所设定的工人阶级形成的四层次(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来审视,新生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传统形式无法平衡,这样的情形在20世纪上半叶长期存在。而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开创翻天覆地的工人运动新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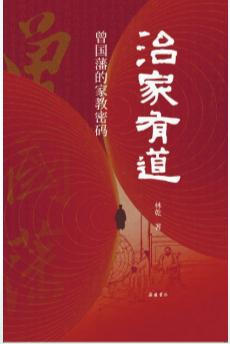
贺萧从社会文化角度的研究,与同时代中国学者从政治传统角度作出的研究截然不同,开启中国“生活史”“新工人史”研究之先河。与此同时,作为西方汉学者,贺萧面对异国文化也存在过度的惊异。此外,本书还对诸多常识性结论展开论述,大费周章,这些都反映出是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认知错位。

贺萧主张从边缘看核心,从外围看整体,最典型的就是将近代家庭作为经济共同体与生存单元,工人家庭人需要工作,都处于高压状态下,异常艰难。特别是为降低劳动成本,工厂出现了女工、童工等弱势群体,这是作者特别关注的部分。宏大的政治历史研究极易忽视工人内部的差异性,而贺萧恰好关注到工人在性别、年龄、籍贯、社会关系、技术程度等因素的区别,她以收入、消费、文化等日常生活为切入点,立足个体化的“小叙事”,打破了传统劳工史研究的单一视角。即便口述史、回忆录具有情感成分,但作为生活史的一部分仍成为令人信服的论据。

最后,贺萧反驳了汤普森(英国工人史、文化史学者)的“工人阶级意识到彼此利益一致”的观点,天津工人置身于众多社会关系之中,他们似乎没有“共同经历”,也不曾“利益一致”。贺萧对结构化的社会形态存疑,她曾提出,“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个纯正的阶级样本”。因为生活的变动,工人内部必然形态各异。《天津工人》中大量的材料呈现出工人阶级各异的日常点滴,能动性与主体性跃然纸上,揭示出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的转变倾向。贺萧着眼于工人本身的行为动机,其历史选择可能与既定的时代主旨不符,但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贺萧撰史的思路,即汤普森所提倡的“人民的历史”。

(作者为天津市作协文学理论批评专委会委员)

## 不做代代为官之想



摘自《治家有道:曾国藩的家教密码》,林乾著,岳麓书社2025年6月出版。

曾国藩申述:

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

他还是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世代做官,事实上不能也根本做不到世代做官。他给妻子欧阳夫人写信时说,我们家里不要有代代做官之想。当官是偶然之事,不是必然的,不能拿这个偶然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当成家族世代的追求,那肯定不行。清朝有十二位铁帽子王,其中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因为功勋卓绝,获得世袭罔替的永久封爵,同时还享有配飨太庙的殊荣。另外四位属于恩封,在清朝中后期稳固江山立功而受封。铁帽子王是来之不易的,要知道八大铁帽子王当年可是跟努尔哈赤、皇太极打天下的,经历了浴血奋战、沙场拼杀,是拿命换来的。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不降封,不像其他的王,如果失宠,就面临降封。到下一代时由亲王变成郡王,再下一代时由郡王变成贝勒,之后由贝勒变成贝子……这就叫降封。世袭罔替就不降封。八大铁帽子王属于功封,打江山有功劳。到了雍正时期,因雍正帝的十三弟胤祥,对雍正朝的治绩助力甚大,遂得世袭罔替的许可,为铁帽子王,这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九位铁帽子王,属于恩封的。但是,非皇室宗亲封王是很危险的,像信吉、吴三桂等。自古以来,官职越高,风险越大。基于此,曾国藩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做官,做高官。他曾给几个弟弟写信说:

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此话之意是说如果弟弟们看透这层道理,那就不会觉得自己在朝中将来做大官就了不得。很多做了高官的,在位期间如果犯了重大的错误,被撤职查办,那么家族也就随之消散。

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原本从江西迁到湖南衡阳,又从衡阳迁到今天的双峰县荷叶镇定居。在曾氏家族历史中,五六百年都是寂寂无名,虽有读书人,却无人考取过功名,连秀才都没有。但是,这个家族能够长期延续,自然有一种家族传统在维系,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曾有一副对联就是答案,这副对联的原文是:

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

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

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家族能长久下去的真理所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信天命,“天”就是天帝,中国人畏天;一是信祖宗,我们在遇到重大难题时,常说祖宗保佑后代平安安之类的话。要知道,老天离我们远,只能敬畏,祖宗才是我们生活中存

在的,离我们很近。《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

从祖先留下的家训就可以看出,曾国藩把家族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并概括祖训为“八字诀”: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这里的第一个字就是书,读书第一,延续了祖父的家训。到了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时,家传对联给子弟: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把诗书和田园结合为半耕半读,上升到家风的层次,要代代传下去。后面讲如果没有做官,也没有对君主进谏的责任,那么国家方针大政就沒资格参与,对于时事也不要轻易评论,当然这是在当时的集权政治下的状况,不像现在的民主社会。不希望子孙辈轻易谈论国政,但是寄望于将来子孙能在朝为官参与国家的大政,这是老父亲对曾国藩这一代的殷殷期许。不像我们今天有的家长,目光短浅,老算经济账,说花那么多钱供孩子读书,最后却连工作都找不到,读书纯粹无用。其实这种家长太短视,用经济来衡量子女的读书,不知道读书对孩子的成长的重要性。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参加三次会试后才登第,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这一年他二十八岁,应该说这个年龄不早也不晚,大体还可以。李鸿章和胡林翼是二十五岁中进士,年龄比曾国藩小,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则更早,十二岁时就中了秀才,次年中举,因为年龄太小,被考官故意压了几年,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曾国藩不算早,也不算晚,太晚的话,对他来说就没有机会了。明清时期,做官如同上阶梯,要一阶一阶往上走,年龄太大的话,就很难继续走过去了。曾国藩考中后,运气不错,没多久参加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能成为庶吉士的都有机会平步青云,张居正即庶吉士出身。清朝时,汉人大臣亦多出于翰林院庶吉士。进士中比较优秀的才能入选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曾国藩就这样留在了翰林院,后来经过散馆考试,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的官职。曾国藩入翰林院后,其父亲当然也不能免俗,说儿子进了翰林院,可了不得,清朝有“宰相出翰林”这一说,说不定自己的儿子将来当宰相都有可能。所以,曾国藩告假回乡后,曾家大摆酒席,大宴宾客三天,自然免不了收点人情礼。这个情形曾国藩的日记写得很清楚,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的祖父把他的父亲叫过来说,宽一(曾国藩的乳名)虽然点了翰林,我们家还是要种田吃饭,不能拖累他。这几句话对曾国藩一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后来他一直告诫自己,坚决不做贪官,这一条底线要守得住。祖父训斥他父亲这几句话,就是家训,告诉大家不要忘了本分,孙子做了大官,不要觉得家里就了不得,何况只是出了一个翰林,还没做大官。

